



評論
傳
世

從八點成果共識看中美關係重回理性軌道



中美關係
鄧飛

中美元首會晤達成八點成果共識，除了認可中美經貿磋商機制積極作用和雙方經貿團隊磋商成果，以及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對話等焦點外，最為重要的是，無疑是雙方同意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其意義不但在於為中美探索大國相處之道提供更明確的戰略指引，甚至對整個世界，都有深遠的啟示。

綜觀八點成果共識，既有雙方立場和態度上的確認，也不乏務實的合作推進。在基本的立場確認方面，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可視為八點成果共識的總綱。過去數年，中美關係屢遇波折，根源就在於部分人習慣以單邊主義思維看待兩國互動，把大國關係簡化為零和博弈，動輒以遏制、脫鉤作為手段。惟現實證明，中美兩個大國合則兩利、鬥則俱傷，而現在，一個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正是對過去錯誤路線的糾偏。大國相處，首要就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與發展道路，不把自身制度與價值觀強加於人；公平，就是雙邊交往不能只追求單方面獲益；對等，則意味任何措施都不能單方面施加限制。可見，「尊重、公平、對等」三個關鍵字不是空泛的外交辭令，而是兩國基於

實際經驗共同確認的相處準則，為後續所有領域合作劃定基本框架。

中美不是天生的「敵人」

在這個基礎上再看其餘共識，即可見其中的深意。例如會談中兩國元首憶及中國和美國是二戰盟友，並肩作戰贏得戰爭勝利，值得細味。這段歷史記憶證明了一個基本事實：中美不是天生的「敵人」，尤其是當今國際社會，一些輿論刻意渲染「新冷戰」敘事，非要將兩國關係描繪成不可調和的對立。**因此特別提及中美兩國作為二戰盟友的歷史事實，一方面是對這種對抗敘事的反駁，另一方面則說明儘管中美政治制度不同、在部分領域存在競爭，但在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及戰後秩序上，雙方立場是一致的。**

此外，雙方同意相互支持對方辦好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和G20領導人峰會，還表示兩國元首有意出席對方主辦的會議。一來顯示多邊合作重新成為兩國關係主軸，二來說明中美領導人往後還會有更多互動，兩者都是向國際社會傳達出對未來的穩定預期。當前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地緣衝突此起彼伏，國際社會最不願意看見的，就是兩個大國互相拆台，把多邊機制變成對抗的戰場。

如果說APEC跟G20峰會的安排是傳達樂觀的合作預期，那兩國元首同意伊朗

應履行不發展核武器的承諾，任何國家或機構都不得對國際水道徵收通行費，則是對「走火」風險的管控。現時中東無疑是最錯綜複雜的地區問題之一，一旦處理失當，很容易引發連鎖動盪與人道災難。這項共識的核心在於，中美雙方認識到兩國在不同方面的分歧，但仍然能在維護全球航道安全、防擴散這類全球性共同利益面前找到合作的最大公因數，為避免衝突升級，其後透過外交手段化解危機打下基礎。

至於務實合作方面亦取得不少顯著成果。例如經貿合作，可說是當中最大的亮點，包括雙方認可建立並推進貿易理事會等機制，達成300億美元對等降稅安排、延期吉隆坡經貿磋商成果等。經貿往來一向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過去數年的關稅摩擦，無論對美國消費者還是中國企業，都帶來沉重負擔，全球供應鏈亦深受衝擊。這次對等降稅，不是一方單方面讓步，而是雙向互利的安排，減輕兩國企業與民生負擔，意味中美經貿將重回對等磋商的軌道。

人工智能對話機制的建立，更是回應了當下時代與雙方競爭面臨的挑戰。一方面，科技競爭無可避免，但競爭不等於全面封殺，建立對話機制管控風險，防止科技領域的分歧演變成直接對抗，這對全球科技治理有示範作用。另一方面，人工智

能技術高速發展，帶來巨大發展紅利，同時伴隨風險。無論是技術安全、倫理規範，還是避免技術誤引引發意外衝突，都需要大國之間持續溝通。

至於特別強調禁毒執法部門合作，同樣也是雙方從單方面施壓，轉為尋求共識的另一項表態。毒品問題過去是中美之間產生對抗的其中一個原因，因此，特地指出近期雙方密切合作，在兩國抓獲數十名相關犯罪嫌疑人，潛台詞就是打擊毒品問題已從分歧轉變成雙方加強合作的新共識。從更實際的角度而言，新精神活性物質跨國流竄，禍害全球青年，毒品犯罪本就是不分國界的共同威脅。這類執法合作不涉及地緣政治對抗，直接惠及兩國普通民眾，是中美合作雙贏的典型範例。

香港獨特優勢可充分發揮

最後，大熊貓保護合作，看似是人文小事，卻有獨特的象徵意義。大熊貓長期以來都是中美民間友好的象徵，新一對大熊貓抵美，重新開啟兩國在野生動物保育、生態環境保護的合作。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不僅有高層外交、經貿博弈，亦離不開民間情感的積累。生態、動物保護這類人文領域合作，可以軟化兩國社會的對立情緒，拉近普通民眾的距離，為雙邊關係打下民間基礎。

當然，我們亦要清醒認識到，達成了

八點成果共識，不等於中美之間所有分歧一夜消失。兩國在價值觀、發展模式、部分地緣議題上的差異客觀存在，不會因為一次元首會晤就徹底化解。共識是起點，不是終點；共識要落地，需要雙方恪守承諾，避免單方面採取損害對方核心利益的行為。管控分歧，擴大合作，是長期的工程，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對於香港而言，中美關係重回穩定軌道，是絕對的利好消息。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繁榮的根基就在於穩定的國際環境與暢通的跨國聯繫。**中美保持建設性互動，全球經貿、科技、人文交流得以維持，香港獨特的優勢也可以更充分發揮。香港社會亦應該以務實冷靜的視角看待中美關係，善用自身優勢，在兩國交流之間扮演積極的橋樑角色。**

放眼世界，全球正處於動盪轉型的關鍵階段，國際社會渴望穩定，期待大國承擔責任。八點成果共識，證明兩個大國完全可以找到共存之道：競爭客觀存在，但競爭必須守規則；分歧難以避免，但分歧可以管控；兩國有各自的利益追求，但可一同為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作出貢獻。尊重、公平、對等，不僅是中美相處之道，也應成為當今國際大國互動的典範。願雙方能夠落實共識，持之以恆，讓中美關係持續走在建設性穩定的軌道上，造福兩國人民，惠及全世界！

把基礎科研所長轉化為高增值增量

——「一五」規劃香港創科的突圍之路



學者論衡
謝來風

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和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是國家賦予香港的重大使命，也是香港在國家和全球創新體系中的獨特方位。香港「一五」規劃第二篇第九章和第三篇第十一章對如何實現這一使命作了詳細論述。細讀不難發現，香港明確構建「三大創科園區、五大研發機構」新格局，將資源集中於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微電子等特色領域。這背後是一條清晰的路徑選擇——發揮香港優勢、聚焦國際前沿科技領域，強化原始創新基礎科研實力，主攻特色創科細分領域，走差異化、高增值之路。

一、做什麼：主攻特色創科細分領域，比較優勢下的差異化戰略選擇

經濟學家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指出，經濟體應將資源集中於相對效率最高的環節，通過分工與交換實現整體福利最大化。放到國家創新版圖中，香港的獨特優勢十分明顯：擁有全球5所百大高等院校、InnoHK創新平台匯聚國際頂尖科研團隊，以及在普通法體系、雙語環境下的知識產權保護環境和國際資本通道。可見，香港創科強在基礎科研、國際科技合作以及金

融服務，而不在大規模製造。倘若無視這些優勢，硬要走「從實驗室到生產線全程包辦」的全產業鏈道路，香港不僅會陷入邁克爾·波特所警示的「夾在中間」困境——既無成本優勢，又失聚焦優勢，更會與內地城市形成同質競爭。

規劃對此有着清晰回應：河套香港園區聚焦研發、轉化與中試，新田科技城承接原型、中試與量產，再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完整的產業供應鏈結合。規劃還明確提出與深圳實現「合作研發、協同轉化、共享發展」，鞏固提升「深圳—香港—廣州」全球創新集群領先地位；香港負責「從0到1」的原始創新，灣區腹地負責「從1到100」的產業化放大。這正是波特在《競爭戰略》中所論的差異化戰略：不與兄弟城市拚體量、拚產值，而拚原創能力、拚國際規則、拚單位要素的高增值產出。

基於對自身優勢的清晰認知，香港也明確了在以下細分領域上精準發力。生命健康方面，建設臨床試驗體系，依託可套「一所一中心」協同效應，目標成為亞洲首選的早期臨床試驗中心；人工智能方面，以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為領頭羊推進「人工智能+」行動，聚焦生命健康和具身智能兩大基礎場景；微電子方面，以香港微

電子研發院為基礎建設首個在港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專攻功率半導體這一戰略細分。這些領域有一個共同點：研發投入大、周期長、附加值高，恰恰匹配香港耐心資本充沛、法治環境健全的長板，而避開了土地、人力成本昂貴的短板。差異化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揚長避短的最優解。

二、怎麼做：「政產學研投」協同，打造香港版的「三螺旋」運行機制

明確了「做什麼」，更需要一套有效的機制，讓政府、企業、高校、金融資本等要素有機組合並產生化學反應，形成開放且極具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正如埃茨科維茨的「三螺旋」理論，強調大學、產業、政府並非孤立的系統，而是通過持續的動態互動、機制協同與彼此重塑，構成驅動區域創新的三股核心力量。而弗里曼的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則強調政府的核心職責是提供制度供給並分擔早期創新風險。

過去，香港創新生態系統的部分要素有所缺失：比如產業化能力不足，有研究指出香港高校90%的成果停留在實驗室；企業創新投入僅佔全社會研發投入的38.9%且近年來持續下降；金融對創科的支持不夠，香港貿發局調查報告顯示香港

創業者的個人儲蓄佔初創企業資金近6成，天使投資（7%）、風險投資（3%）等佔比極低。

香港「一五」規劃提出「政產學研投」協同體系，正是看到了這些問題。政府將更加積極有為，優化創新科技發展體制，強化政策和制度供給，引導金融資本投入科技；源頭在「學」，強調發揮大學基礎研究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平台在「研」，五大研發機構加上新設的生命健康研發院、香港微電子研發院、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專門填補從論文到產品之間的「死亡之谷」；空間在「產」，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科學園及數碼港構成「北中南」三大創科園區，同時加強與內地合作，打造跨境產業鏈；資本在「投」，推出100億元創科產業引導基金，預期撬動至少400億元市場資金，連同25億元創科創投基金優化計劃和港投公司的耐心資本布局，形成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的投資接力。

可見，香港版的「三螺旋」還多了一重跨境維度，而這也正是「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在創科領域的生動註腳。

三、誰來做：北部大灣城擴容，育才引才留才一體化的長遠謀劃

方向和機制都有了，關鍵還要靠科技

人才來推進落實。香港「一五」規劃第三篇披露了一個重磅安排：北都大學城由新田、洪水橋、打鼓嶺三個大學城組成，按「一城五元素」（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城市）理念協同發展，總面積擴容至逾1000公頃。

從單體校園規劃躍升至逾千公頃的教育科技人才綜合體，這一擴容絕非簡單的土地擴張，而是育才、引才、留才一體化政策考量的空間表達。規劃明確提出，要推動本地院校擴容提質、吸引國際名院校進駐合辦頂尖課程、組建聯合學院和實驗室，並把學科布局與新田大學城「醫學、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機器人、微電子」的產業定位精準咬合，實現人才培養與產業需求同頻共振。大學城與河套園區、新田科技城毗鄰布局，學生走出校門即是園區、即是產業鏈；配套上，北部都會區五年7萬個住宅單位、「15分鐘生活圈」、新界北醫院聯網同步推進，讓人才上得起學、安得了家、看得見前途。突破傳統理念，讓校區向外延伸，打造「校區+園區+社區」融合模式，唯有這樣，香港才能真正培養好、引得進並留得住人才。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

打造服務內企出海的風險管理和爭議解決高地



議事論事
劉洋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出臺後，社會關注較多的是創科發展、北部都會區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鞏固提升等議題。這些固然重要。但從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內地企業持續「走出去」的現實需求看，香港還有一項功能值得進一步做深做實：建設成為服務內地企業國際化發展的風險管理及爭議解決高地。

過去談企業「走出去」，更多着眼於市場、項目、融資和訂單。今天的形勢已明顯不同。企業出海面對的，不只是商業機會，更是不確定性顯著上升的外部環境。地緣政治變化、制裁與出口管制、東道國政策調整、匯率波動、供應鏈擾動、數據合規、網絡安全等問題交織疊加，使不少有商業價值的項目，因風險預判不足、法律安排不周、爭議應對失當，付出遠高於預期的代價。因此，今天講「走出去」，不能只看企業能否進入國際市場，更要看其能否在複雜環境中行穩致遠。企業真正需要的，不只是連接國際市場的平台，更是能夠在投資、交易、履約、爭議解決到執行回收全過程中提供支持的專業樞紐。

香港有條件承擔這一角色。香港同時具備中國優勢、普通法制度優勢和中英雙語環境，法律制度成熟，專業服務完備，仲裁、訴訟、調解等機制齊全，既對接國際規則，也熟悉內地企業的經營方式和實

際需求。對企業而言，這些都是具體保障。無論是境外投資談判、融資安排、合同設計，還是爭議發生後的保全、追索和執行，企業最看重的始終是規則是否清晰、程序是否可信、結果是否可執行。

發揮事前防範風險作用

多年來，香港常被概括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這一定位並沒有過時，但在當前環境下，僅有「連接」已不足夠。對於越來越多出海企業而言，香港更應成為「落腳點」和「支撐點」，幫助企業在項目啓動前看清風險，在項目推進中穩住問題，在爭議發生後控制損失。這一點在共建「一帶一路」背景下尤為突出。「一帶一路」為內地企業拓展國際市場打開廣闊空間，但項目所在地區的政治、法律和商業環境差異很大。企業面臨的，往往不只是合同履行分歧，還可能疊加當地政策變化、付款風險上升、資產追索困難、跨境執行複雜等問題。不少企業在前期更重視交易落地和商業推進，對適用法律、爭議解決條款、資產控制和後續執行路徑考慮不足，等到糾紛真正出現，才發現前期少做的一步，往往就是後期最難補的一課。

因此，香港的價值不能只體現在「事後解決爭議」，更應體現在「事前防範風險」「事中控制風險」。

在前端，香港可以在交易架構、盡職

調查、融資與擔保安排、合同條款設計、制裁與合規評估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跨境項目真正的韌性，往往取決於基礎工作是否扎實。法律和風控安排做得越早、越細，企業日後處置風險時就越主動。

在項目進行過程中，香港也可以幫助企業在矛盾激化前及早介入。大量跨境爭議並非一夜之間爆發，而是在付款延遲、履約分歧、證據留存不足、外部環境變化中逐步累積。企業這時需要的，不只是單一程序選擇，而是綜合判斷：何時保存證據，何時採取緊急措施，何時爭取商業解決，何時同步部署不同法域的行動。

調解在此類案件中的作用，也值得更認真看待。調解並不意味着放棄立場，更不等於退讓。在合適案件中，調解恰恰是把法律優勢轉化為商業成果的務實手段。香港正推進國際調解發展，國際調解院也已在港設立，這為香港完善多元爭議解決體系提供了新的契機。

當然，真正重大的跨境爭議，最終仍要依靠成熟可靠的正式機制處理。香港仲裁制度成熟，法院處理跨境商事案件經驗豐富，法律人才儲備深厚，中英雙語環境也有利於不同背景當事人參與程序。特區政府提出推動國際商事法庭建設、完善仲裁法律制度、加強國際法律人才培訓，方向是正確的。對企業來說，制度優勢最終要落到一點：關鍵時刻能否真正解決問題。

實務中，企業需要的往往不是單一程

序，而是一整套可協同運作的方案，包括緊急仲裁、禁制令、證據保全、資產追蹤、跨境執行、並行調解，甚至與清盤、破產程序銜接。所謂「一站式」，如果要落到實處，靠的不是概念，而是能否把法律服務、商業判斷和執行能力真正整合起來。

其中，資產回收最能檢驗一個爭議解決體系的成色。很多案件裏，贏得裁決或判決只是第一步，能否及時鎖定資產、阻止轉移、實現回收，才是決定成敗的關鍵。跨境糾紛一旦牽涉多層持股、離岸實體或多法域資產，案件處理就不能停留在紙面勝訴。香港在禁制令、資產追蹤、判決和仲裁裁決承認與執行方面有扎實實踐，又處於連接內地與國際市場的關鍵位置，因此在這一環節尤具優勢。

航運和貿易領域，更能體現香港的綜合能力。國家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位，特區政府提出推動「金融+航運」，並非簡單產業疊加。現實中，航運和貿易爭議往往同時涉及租船、貨損、保險、融資、擔保、制裁、扣船和執行等多個問題，處理起來高度綜合。香港在航運、貿易、保險、金融與爭議解決之間形成的完整生態，正是其競爭力所在。

提升制度供給和專業能力

同時也要看到，「出海」的主體正在變化。除了傳統基建、製造和能源企業，越來越多平台企業、高端製造企業、人工

智能和數據驅動型企業正在走向國際市場。它們面對的，除了傳統合同和付款風險，還有數據跨境、網絡安全、知識產權、數字資產等新問題。香港若要把這一定位做實，就必須在這些新領域同步提升制度供給和專業能力。

首個五年規劃的公布，正好提供了新的起點。香港當然要繼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地位，也要繼續發揮普通法制度和專業服務優勢。在此基礎上，香港完全可以再向前一步，更明確地把自身打造成為內地企業「走出去」過程中可信賴、可依託、可落地的風險管理及爭議解決中心。

說到底，企業選擇一個平台，不只看它能否幫助成交，更看它能否幫助善後、控險和回收。在國際環境不確定性上升的今天，穩定預期本身就是競爭力。誰能幫助企業把風險管得更早、爭議解得更穩、權益護得更實，誰就更有價值。

從這個意義上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不僅關係香港自身下一階段發展，也關係香港如何更好服務國家所需。若能把自身優勢進一步轉化為制度能力和實際成效，香港在服務內地企業「走出去」中的獨特作用將更加突出，其國際法律和專業服務中心地位也會更加穩固。

海門律師事務所香港辦公室合夥人、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律政司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專家諮詢組委員